

“无名困境”之名

——社会心理视域下《觉醒》与《达洛维夫人》中的女性生存困境

王楠, 罗艳梅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自凯特·肖邦的小说《觉醒》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达洛维夫人》首次出版以来, 围绕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自主地位和女性身份的讨论层出不穷。通过将两个女性主义经典文本与社会心理视域下的“社会性疼痛”理论结合, 分析两部作品中女性困境书写的相似性, 得出两位女主人公都经历了饱含疼痛的生存困境, 揭示了造成困境的三个渐进性因素, 即婚姻和母子/女关系中的价值感缺乏、替代亲密关系的终止以及社会支持的缺失, 并将这一“无名的困境”定义为“社会性疼痛”。

关键词: 女性主义小说; 生存困境; 社会性疼痛; 《觉醒》; 《达洛维夫人》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4)06-0534-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20621308

The Name of 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Living Predicaments of Female Protagonists in *The Awakening* and *Mrs Dalloway*

WANG Nan, LUO Yanm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Much has been discussed about the autonomy and female identity of Edna in Kate Chopin's *The Awakening* and Clarissa in Virginia Woolf's *Mrs Dalloway*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bridges the two novels and the social pain in social psychology, arguing that the living problems the protagonists as femal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remain unsolved due to three progressive factors: loss of sense of worth as a wife and mother, abortion of their extramarital liaisons and failure to find other social support. The paper names the predicament that “has no name” as “social pain”.

Keywords: feminist novels; living predicaments; social pain; *The Awakening*; *Mrs Dalloway*

《觉醒》(1899)和《达洛维夫人》(1925)两部小说作为西方女性主义的经典文本, 揭示了西方社会上层女性在婚内以至阶级社会中遭遇的精神困境。两部作品问世以来, 分别接受了女性形象分

收稿日期: 2022-06-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9BZX098)

作者简介: 王楠, 女, 教授。研究方向: 英语小说与当代西方文论。E-mail: wangnan@mail.bnu.edu.cn

析^[1]、女性主义叙事^[2]等视角的广泛评论。既往学者或发表论断,称两位女主角的消极抵抗为女性意识的成功觉醒,或从两本小说并不明朗的结局下定论称其觉醒失败。也即,学界多将两位经受多重困境,四面楚歌的复杂女性形象进行成功/失败的二元总结,而少有人将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共同经历的“无名的困境”进行对比,并梳理该困境产生的过程和根源。本文转向社会心理视域,考察两部经典作品中女主人公生存困境书写的相似性,从小说结局入手论证埃德娜·蓬特里尔和克拉丽莎·达洛维的生存困境因家庭关系、社会支持的缺位而自始至终未被解决,并将这一“无名的困境”定义为“社会性疼痛”。

一、《觉醒》与《达洛维夫人》中的社会性疼痛

“社会性疼痛”(social pain)指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由于紧密的社会联结受到威胁或崩坏时所产生的情感性疼痛^[3]。这一理论旨在论证社会关系是人类存在的核心,提出构建长期、稳定、紧密的关系能够满足社会中相互依赖的个体与生俱来的归属感需求。而关系贬损(relational devaluation)和人际疏离则会引发诸如孤独、避世、无助等高强度的伤痛情感,造成自尊水平和自我调节能力的下降,以及死亡倾向、生命脆弱感和环境威胁感的上升^{[4]393}。贾亚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的理论挑战了传统女性主义批评家提出的消极抵抗观点,传统观点相信女性必须经由独处“走进自己的内心”^[5]以解决生存困境。这一战略性撤退的典型方式是,女性在挫折感和愤怒中将自己囿于“一间自己的房间”。正如女性主义评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所说,躲进“一间自己的房间”会让女性的情感和经验无处宣泄,进一步加深女性与外部世界的隔阂^{[6]270-271},使自己的一间屋“终成了一座坟墓”^{[6]275}。她同时指出这样离群索居的“女权主义意识是一种令人痛苦的心境”^{[6]266},点明了女性因社会关系受挫而与社会疏离,又因这种疏离引发心理创痛,形成恶性循环。“社会性疼痛”理论则与此相对地指出解决困境的根本在于与其他社会成员的联结,即建立健康的亲密、亲子关系,获取足够的社会支撑。该理论赋予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提出的“无名的问题”^[7]以答案,即曾经因家庭生活、社

会期待等诸多因素引发的女性难以名状的痛苦、负疚、孤立无援之感,可被命名为“社会性疼痛”。

本文借用“社会性疼痛”理论对《觉醒》和《达洛维夫人》中两位女主人公的生存困境进行对比,主要基于如下考虑:《觉醒》和《达洛维夫人》的创作时期均值18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两个文本均聚焦于中上层阶级女性在家庭内部乃至社会关系中遇挫后遭受的心理创痛,且两位女主人公的心理创痛最终都引发了对自杀的行动或认同;小说中由亲密关系、社会支撑等核心关系的缺位带来高强度的情感创痛,并在极端的情况下诱发死亡倾向的书写则与“社会性疼痛”的观点不谋而合。因此,本文将依次从家庭内部亲密关系的价值感缺失、替代性亲密关系的终结、寻找其他社会支持的失败三个层面来探讨女主人公遭遇的社会性疼痛的根源,以求挖掘和剖析特定历史语境下女性主义作品中女性生存困境书写的共性,拓展对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阐释维度,为女性生存困境的化解提供现实方案。

二、贯穿始终的女性生存困境

批评界就埃德娜和克拉丽莎的结局是女性主义的成功典范还是惨痛教训莫衷一是。通过分析《觉醒》和《达洛维夫人》中两位女主人公的结局,本文认为,埃德娜和克拉丽莎二人虽然走向不同的生死结局,但均不是文学作品中女性觉醒的成功案例,因为其遭受的社会性疼痛都贯穿始终,从未被解决。

《觉醒》中埃德娜的自杀是她无力改变现状,在社会中的自我身份定位失败后有预谋的无奈之举。在小说结尾,埃德娜见到秘密情人罗伯特留下的告别信后全然陷入消沉。“她把自己交付给‘命运’,漠然地等待着结果。”^{[8]136}在决定溺水自杀之前,她被诸如失眠、食欲不振、精神恍惚等身体和心理症状折磨,这种折磨一直延续到她生命尽头在海中最后几次无力的划水,直到“她疲惫的身躯越来越沉重”^{[8]152}。达斯蒂·米勒(Dusty Miller)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拓展了传统认为自杀是自我伤害和缺乏心理韧性的消极观念,提出自杀是在找不到外在表达时,为了降低或消除内心痛苦和愤怒的一种维持心理平衡的自我保护机制,以此论证埃德娜的自杀与女性意识觉醒的胜利或失败并无直接关系^{[9]6}。埃德娜自杀的直接动因看似是她对罗伯特无法控制

的渴望和他抛弃她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埃德娜通过溺死自己唯一可以控制的身体,来缚住爱而不得的疼痛。而根据社会性疼痛理论,使生存困境无解的通常并非只有一段关系,一系列失败的关系才是埃德娜走向遭遇创伤体验的缘由,罗伯特的离去只是将她的生存困境推向顶点。由于埃德娜未能找到外在出口,获得社会支持,控制她的社会性疼痛才日益加剧,使其最终走向死亡。

不可否认,《达洛维夫人》的女主人公克拉丽莎看似选择了与埃德娜截然不同的结局,然而她的幸存也近乎是苟延残喘。小说结尾,作为聚会的女主人的克拉丽莎竟从精神科医师威廉·布莱德肖带来的青年病人自杀的消息中“体会到了快乐”^{[10]203}。克拉丽莎没有可怜自杀者,取而代之的情感是认同和开心,因为死亡的想法也曾在她脑海里涌现:“如果此刻就能奔赴黄泉,那么此刻就是最幸福的。”^{[10]201}克拉丽莎感同身受和视死如归的态度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即女主人公有朝一日也或许会放弃机械麻木的生活。事实上,克拉丽莎看似高枕无忧的生活却充满晦暗消沉的意象。一方面,她与丈夫分居,独自睡在顶层阁楼上,即文学作品中“疯女人”的居所,“床单绷紧了,床很窄”^{[10]49},暗示了克拉丽莎裹尸布般单薄、狭窄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书名“达洛维夫人”没有将克拉丽莎作为妻子之外的任何身份合法化;其次,本书的另一位主人公,罹患弹震症的赛普提默斯是克拉丽莎意识上的双胞胎,小说结尾,克拉丽莎对这个年轻男人的自杀表示出的认同,使毫无关系的两人以情感认同的方式交汇,给克拉丽莎的生活走向蒙上了晦暗的阴影。由此可见,埃德娜和克拉丽莎自始至终遭遇着未解决的、难以名状的痛苦。本文通过考察两位女主人公作为妻子、母亲的 家庭角色,以及作为情人、朋友的社会角色,以期找到导致其“无名的困境”的症结所在。

三、缺席的丈夫和孩子

埃德娜和克拉丽莎长期面对丈夫与孩子的缺席,使其在妻子与母亲的 家庭角色中难以寻找到价值感。《觉醒》中,丈夫莱昂斯·庞德烈缺席于埃德娜的生理、心理双重层面。他忙于工作,流连于俱乐部,以至于埃德娜从情人阿尔塞·阿罗宾那里才“第一次真正用本能去回应一个吻”^{[8]109},才第一次被点

燃了生理欲望。在心理层面,莱昂斯也与妻子缺乏共同语言。正如埃德娜所言,“她嫁给莱昂斯·庞德烈纯属意外”^{[8]23},从而排除了这段关系中相互吸引之爱的因素。因为邂逅丈夫时,她正处于对一个不可成为其真实伴侣的男演员的“秘密的痴恋”^{[8]23}中,埃德娜对莱昂斯的感情更像是弗洛伊德所言的“移情”在作祟。由于不可得的幻想之爱无法实现,嫁给莱昂斯成为埃德娜“在现实世界里体面地生活”^{[8]24}的捷径,而莱昂斯更是仅将妻子视作自己的“贵重物品”^{[8]4}。当妻子陷入抑郁,搬出家门另辟住所时,莱昂斯毫不在乎妻子的心理状态,仅仅将妻子离家视作他私人财产的损失。无法在婚姻中得到生理和心理需求的满足,成为埃德娜走向“觉醒”的开端。

同样,克拉丽莎·达洛维的婚姻生活也缺乏生理和心理满足。虽然克拉丽莎宣称婚姻“必须要有那么一点点独立的空间”^{[10]6},从她在阁楼上的单人床和对旧爱彼得·沃什尔的反复回忆中,也可窥见其婚姻生活中与丈夫的罅隙远不止其轻描淡写的一点点,因而对“独立的空间”^{[10]6}的颂扬也沦为对丈夫在婚姻中生理缺席的自我安慰。此外,克拉丽莎也自知自己的婚姻生活布满情感空虚。为成为“达洛维夫人”,她牺牲了自己的名字,使“她有 种古怪异样的感觉,感觉自己成了个隐形人,没人看得见她,没人认识她”^{[10]10}。丈夫理查德·达洛维将送给妻子的花作为“一把枪”^{[10]126},作为面对妻子质问为何没有带她去参加聚会的反击的武器,而丈夫“无法对她尽情诉说”^{[10]128}的真相也再次向克拉丽莎揭示婚姻生活里的感情空虚。因此,刻意与丈夫保持距离并非克拉丽莎作为独立女性的标志,而是对丈夫生理和心理缺席的反抗,因为她仍然终日沉湎于过去情感丰满的回忆以填补空虚。大量的回忆书写和现实的缺位显化了达洛维夫人在婚姻中无法满足的需求。

同时,肖邦和伍尔夫分别在《觉醒》和《达洛维夫人》中对于埃德娜和克拉丽莎的母亲角色都着笔较少,两位主人公对自己的孩子都有疏离感,这也导致她们无法在核心家庭关系中寻找安慰。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女性主义小说“情节本身就要求母性离场”^{[11]67}。《觉醒》和《达洛维夫人》也并未书写家庭情节来还原女性作为母亲和妻子的生活,而是试图展示女主人公的心理、生理和精神面貌,还原女性在生存困境中挣扎的过程。

首先,埃德娜和克拉丽莎的母亲角色分别被保

姆和家庭教师取代。其次,埃德娜并未像传统母亲角色一般表现出对儿子的强烈依恋。而《觉醒》中阿黛尔·拉蒂诺尔一角正是传统母亲角色的典范,她不断提醒埃德娜要以孩子们为中心,但埃德娜对孩子们的喜爱和思念仅局限于他们在场时。虽然埃德娜与孩子分开时感到焦虑和痛苦,但一到了独居的城里,孩子们唱的歌就“不再响彻她的灵魂”^{[8]124}。埃德娜并非不爱自己的孩子,但父权社会对母亲的期望“打败了她,制服了她,要把她的余生拖入灵魂的苦役”^{[8]151}。此外,埃德娜对母亲身份的疏离或许也与孩子的性别有关。根据女性传递(female transmission)这一观点,母亲和女儿间的亲缘纽带使女性经验母女相传,由此可避免女性困境的代际重复^{[11]67}。因此,若埃德娜有女儿,她可能会找到一条更积极的出路,她或许会将自己的困境向女儿倾诉,同时使年轻一代女性不再重复母亲的故事。然而,由于没有女儿能倾听和理解她的困境,她不得不把自己推向深渊。

然而,克拉丽莎与女儿伊丽莎白间的“女性传递”却遭遇重重阻碍。一方面,母女因为血缘关系而不可分割,因为性别相同而具有更强的认同感,因此,她并未同埃德娜一般回避自己作为母亲的角色。相反,她称女儿为“我的伊丽莎白”^{[10]51},暗示了克拉丽莎对与女儿建立亲密关系的渴望。然而,在克拉丽莎看来,她的伊丽莎白却被有同性恋倾向的家庭教师多丽丝·基尔曼夺走了。伊丽莎白挣脱母亲和家教的束缚,独自乘车在伦敦街头漫游,暗示着新一代女性或许会抛弃传统女性模型,为自己创造新的可能性。伊丽莎白拒绝重复母亲的故事,这其中也可见母女间女性传递的力量。但母女关系却不是达洛维家庭内部联结最强的纽带。克拉丽莎少女时代的密友萨莉·西顿曾说,克拉丽莎的丈夫理查德·达洛维是“一个只关心小猫小狗的人”^{[10]206},而克拉丽莎也指出,“伊丽莎白最关心的是她的小狗”^{[10]11}。这暗示了达洛维一家中强度超越女性纽带的父系传递。通过向父亲的价值观靠拢,伊丽莎白在社会中或许会拥有更多的可能性,但同时也使母亲在家庭内部的三元关系中受到孤立。

四、失败的替代性亲密关系

由于家庭内部难寻归属感,埃德娜和克拉丽莎都尝试寻找替代性的亲密关系。不幸的是,埃德娜

的婚外情和克拉丽莎存在于回忆中的亲密关系均以失败告终。埃德娜与罗伯特在格兰德岛上的夏日共游标志着浪漫爱情的萌芽。但夏日飞逝,当罗伯特发现埃德娜与自己一样对对方萌生了喜爱时,却独自逃去了墨西哥,因为他只能接受基于婚姻和占有的爱情。但埃德娜虚空已久的激情却被唤醒,她日夜思念着罗伯特,“满含着欲望最初的那种悸动”^{[8]40},视对罗伯特的感情为少女时代暗恋之情的延续。正如年轻时对悲剧演员的迷恋一般,埃德娜明知这种感情是无望的,却因这感情与初恋一般难以实际获得,而对它产生了怀旧的迷恋,将其视为崇高的伟大爱情。罗伯特的存在点燃了埃德娜婚姻中缺席的热望,迫使她打着追求自由的旗号离开了她的丈夫,开始独居生活,并向瑞兹小姐骄傲宣告了自己如她一般地独立。但很快,当瑞兹向克拉丽莎展示罗伯特给她的信时,克拉丽莎就忍不住向她和盘托出独居的真实目的源于对罗伯特的爱:“这是她第一次承认这份感情。一股暖流涌上她的面颊,留下片片红晕。”^{[7]106}此外,正当埃德娜醉心于罗伯特时,一个在她心中无足轻重的男人又唤醒了她婚姻生活中缺席的生理激情。但生理与心理激情的割裂同时也唤起了埃德娜对罗伯特的负罪感,她与阿罗宾的关系仅限于性,且这也是她对罗伯特不辞而别的惩罚。因此,当埃德娜再次见到罗伯特,她立即中断了与阿罗宾的关系。

罗伯特的再次出现为埃德娜的性与爱的对象合一提供了可能性。他绵柔的情话从心理层面满足了她的占有欲,使埃德娜感觉自己“已经部分地拥有了他”^{[8]147};同时,从生理层面,“他手臂的触感和他紧贴着她的双唇”使她的“感官又变得鲜活”^{[8]147}。情感和生理需求的同时满足使得“她认为世间最大的幸福就是拥有所爱之人”^{[8]147}。然而,一夜的浪漫与激情褪去后,罗伯特再次抛下埃德娜,暗示了他无法不顾世俗桎梏与埃德娜私会。而这对于埃德娜而言无疑是致命一击,因为罗伯特的离开不仅意味着她逃离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角色的失败,更宣告了她在家庭外寻找亲密关系的努力付诸东流。

相似的是,彼得·沃什尔的首次亮相是在达洛维夫人关于家乡伯尔顿的青春记忆里。克拉丽莎·达洛维回忆着他们坦诚相待的关系,思忖着当初嫁给彼得·沃什尔,而不是理查德·达洛维是否是更好的选择。她细数着与彼得朝夕相处的逝去时光,不时安慰自己嫁给理查德是正确的选择,而这不过是为了抵消频繁想起旧情人的罪恶感。然而,克拉

丽莎为抵抗残酷的现实而倾注于回忆的幻想和情感随着彼得的突然来访戛然而止。真实的他是浑身缺点的凡夫俗子，而不是由想象随意捏造的完美爱人，这使她猛然意识到，自己也不似想象中那么完美。克拉丽莎嫁给理查德时，彼得曾揶揄她像“正宗的女主人”^{[10]65}，如今他一语成谶，克拉丽莎的确成了一场场浮华聚会的女主人。彼得的到来无疑伤害了克拉丽莎的自尊心，使她回忆里完美的爱情支离破碎。待彼得离开，达洛维心灰意冷地退回了独居的阁楼，终于承认了对完美爱情的渴望：“如果当初嫁给了他，这样的快乐就会每天都陪伴我呢。”^{[10]65}或许他不能让她享受上流社会的浮华盛宴，但却是真正理解她的人，“他们总是有种奇特的沟通能力，不需要语言的沟通”^{[10]63}。但随着彼得的离开，“对她来说，一切都结束了”^{[10]49}。在他仅仅将她视为“正宗的女主人”^{[10]65}，并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时，一切幻象都落下帷幕，克拉丽莎再次跌入冰冷的现实。

五、不足的社会性支持

埃德娜和克拉丽莎在经历家庭身份价值感缺失和替代亲密关系的失败后，试图从同性社会中寻找社会性支撑，却同样以失败告终。首先，埃德娜和克拉丽莎虽然都是名流聚会的女主人或常客，却都未能在名利场般的聚会中找到归属感。正如波伏娃所言，女性的“接待”行为实则是为了维护丈夫的社会等级地位，确定丈夫的社会价值，而在这些“实际上无用的关系”中，女性的内心丝毫不会被给予关注^{[12]359}。她们作为丈夫的私人“贵重物品”^{[8]4}，在聚会上充当展品，依照社会准则包装自己。为维护丈夫的社交地位，她们还不得不例行公事般亲自展览自己：埃德娜每周二都盛装会客，克拉丽莎也早已对举办派对得心应手。而这样蜻蜓点水般的交际表演显然无法使她们寻找到能与之深入交流和产生共情的人。对于埃德娜来说，她的朋友瑞兹小姐和阿黛尔·拉蒂诺尔分别代表着她生活的两种可能性。前者孤僻冷淡，献身于艺术；后者为丈夫和孩子献身于家庭。然而，两者都并未为埃德娜提供同情的庇护所。

瑞兹小姐作为社会准则的颠覆者，似乎是未曾从家庭关系和亲密关系中找到归属感的埃德娜的榜样。然而埃德娜不同于瑞兹，首先，她没有瑞兹

那般“无畏……敢于冒险，敢于挑战的精神”。其次，埃德娜陷入对罗伯特的思念而搬进鸽舍后，才开始频繁渴望见到瑞兹，仿佛从“比恩维尔有史以来最不受欢迎的女人”^{[8]77}那里她才能找到冲破桎梏的勇气。而瑞兹深知埃德娜无法像她一般抛却爱恋而投身艺术，便居高临下地赐给埃德娜无谓的希望：“可怜的傻瓜，他爱你啊。”^{[8]127}此外，埃德娜与瑞兹的交集也围绕罗伯特展开，并未涉及她生活的其他情感困境。所以当埃德娜发现罗伯特宁愿写信给瑞兹，并最终离开自己时，她便不再从瑞兹那里寻找同情。阿黛尔·拉蒂诺尔展示了埃德娜作为女性的另一种可能性。但埃德娜并未对她产生认同感。首先，阿黛尔婚后七年内，每隔两年生一个孩子，不论这是对于成为母性照顾者角色的渴望还是出于缺乏计生控制，阿黛尔·拉蒂诺尔的婚姻明显展示出一幅与埃德娜丈夫缺席所不同的场景。阿黛尔的婚姻“生理需求得到满足，暗示了在埃德娜婚姻中所没有被满足的生理需求”^{[13]91}。更重要的是，埃德娜不是拉蒂诺尔般甘于奉献的母亲，正如她所言，“她绝不会为了孩子牺牲自我”^{[8]62}。因此，当阿黛尔邀请埃德娜陪同她生产以求“唤醒”埃德娜的母性时，埃德娜只“模糊地记得那强烈地疼痛的感觉”，而体会不到柔软的母性和情感联结。更重要的是，阿黛尔从未真正了解过埃德娜的生存境遇。当埃德娜陷入婚外情时，作为朋友的她只是专断而狭隘地从父权角度警告她当心“毁掉一个女人的清誉”^{[8]125}。因此，以瑞兹小姐和拉蒂诺尔夫人为代表的女性群体都没能为埃德娜提供容身之地。

《达洛维夫人》中，克拉丽莎的丈夫投身政治社交，长期缺席，女儿长期与家教多丽丝·基尔曼在一起，旧爱彼得·沃什尔也因为“那些印度女人”^{[10]7}离开了她。于是，克拉丽莎试图回忆与萨利·西顿的友谊，以慰藉孤独的现实。其实，两人的关系曾一度逾越友谊，到了同性之爱的地步，这从克拉丽莎回忆她们的吻时可以体现：“她这一辈子最为美妙的时刻就来到了。萨利停下了脚步，摘了一朵花，亲吻了她的唇。”^{[10]37}虽然她们身边充斥着男性的话语，“彼德·沃尔什和约瑟夫·布莱科普夫继续谈论着瓦格纳”^{[10]37}，但那一刻“其他人都不见了”^{[10]37}，男性话语也被屏蔽在了“最为美妙的时刻”^{[10]37}之外。萨利的吻像是“一粒钻石”^{[10]37}，此意象在书中的数次重复都暗示了克拉丽莎的同性恋倾向^{[14]55}，每当面对空虚的现实时，克拉丽莎就靠回忆里的“钻石”聊以慰藉。但“老约瑟夫和彼

德来到了她们面前”^{[10]37}，男性目光的拷问使两个女孩不得不结束暧昧，重返现实，这也象征着男权社会下她们的关系难以被接受。于是，达洛维夫人在重述里开启了一段与萨利的回忆之旅。但当克拉丽莎了解到萨利从不羁的少女变成了世俗的富太太，她与萨利精神上的联结逐渐减弱了。当萨利出现在达洛维夫人的聚会上时，她的改变终于使克拉丽莎沉湎于过去的幻象破灭。克拉丽莎从未想过萨利会出现在这样无聊的社交场合，并世俗地将自己的价值归于“我有五个大胖子”^{[10]186}，这使得她从克拉丽莎回忆中的一个无忧无虑近乎雌雄同体的角色，沦为一个试图用自己的世俗哗众取宠的女人，也使克拉丽莎寄希望于萨利能了解自己的困境的想法幻灭。

六、结语

借助“社会性疼痛”理论，重读女性主义经典小说《觉醒》和《达洛维夫人》，可以看到女性主体作为社会成员在多重因素的拉扯下面临的困境。克拉丽莎与埃德娜的生存困境唤起了一种思考：两位女主人公都展示了在痛苦中孤立自我、远离社会的倾向，因为少有人能洞悉她们矛盾的本质；而缺乏支持、理解和归属感又迫使她们进一步将自己圈禁于“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但是，埃德娜和克拉丽莎既没有在孤独中找到新的身份，也没有在反叛中实现精神自主，相反，她们在小说结尾对死亡的认同与实践使自己的一间屋最终沦为埋葬生活的坟墓。本文认为，曾经难以名状的困境，归根结底是由家庭关系中生理和心理需求未得到满足、缺乏替代性亲密关系、社会对妇女形象的刻板化和包容度不足所导致的。克拉丽莎和埃德娜自始至终都经历着令人痛苦的心境，二者对深度交流的回避乃至对死亡的认同并未标志着她们独立自主或情绪自由的实现，而是缺乏健康平等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所引发的社会性疼痛的症状。书写她们的阵痛，足以唤起社会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加深社会对女性需求的理解，还原看似浪漫的婚姻生活背后的灰色境况，对婚姻和母性有更全面的认识，为女性成员搭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未来社会，从中女性可以从家庭内

乃至社会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和理解，而使她们不必近乎偏执地自我流放，独自忍受曾经无名的困境，在社会性疼痛中进一步加深与世界的隔阂。

参考文献：

- [1] 赵冬梅. 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达洛维夫人》中的女性形象[J]. 外语学刊, 2014(2): 130-133.
- [2] 柴玉洁, 吕洪灵. “以倾斜的方式说出”——《觉醒》叙事层面的颠覆策略[J]. 电影文学, 2010(6): 119-120.
- [3] PANKSEPP J. Feeling the pain of social loss[J]. *Science*, 2003, 302(5643): 237-239.
- [4] MYERS D. G. *Social Psychology*[M]. New York: McGraw-Hill, 2012.
- [5] 蒲珊珊. 凯特·肖邦的女性意识探究——以《觉醒》为切入点的考察[J]. 语文建设, 2016(23): 53-54.
- [6] 伊莱恩·肖瓦尔特. 她们自己的文学 英国女小说家: 从勃朗特到莱辛[M]. 韩敏中,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 [7] FRIEDAN B. *The Feminine Mystique*[M].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 [8] 凯特·肖邦. 觉醒[M]. 齐彦婧,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0.
- [9] MILLER D. *Women Who Hurt Themselves: A Book of Hope and Understanding*[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 [10] 弗吉尼亚·伍尔夫. 达洛维夫人[M]. 姜向明, 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11] HIRSCH M. *The Mother/Daughter Plot: Narrative, Psychoanalysis, Feminism*[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2]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II: 实际体验[M]. 郑克鲁,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13] BEER J.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te Chopin*[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4] GOLDMAN J.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Virginia Woolf*[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责编: 朱渭波)